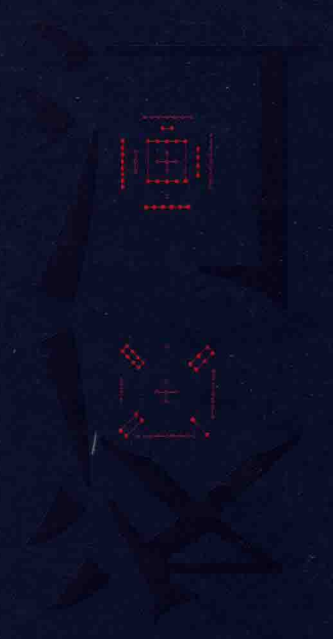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

史善刚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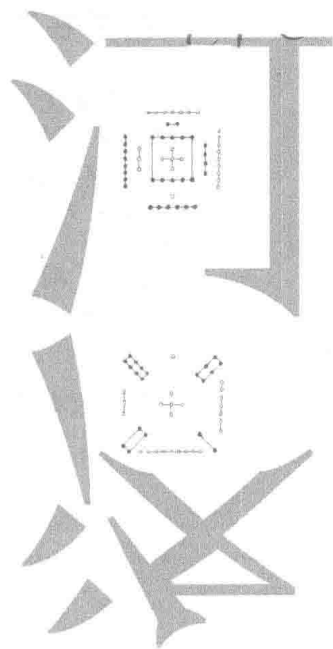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河唐文化與中國書學

張其成 著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

史善刚 谢琳惠 史东雨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 / 史善刚, 谢琳惠, 史东雨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0216 - 3

I. ①河… II. ①史… ②谢… ③史… III. ①文化史
— 研究—河南 ②《周易》—研究 IV. ①K296.1 ②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492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28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8.00 元

绪 论

河洛文化,就它所产生的地域而言,是以黄河与洛水为连线,向四周辐射的广大中原地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秦晋、燕赵、齐鲁、荆楚等的周边地区。它北控幽燕,南引江淮,西吞秦陇,东吐河下平原,有所谓“天下之中”(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国”之源(见西周《何尊》铭文),成为古代中国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尤为优越。

从历史上的记载和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河洛文化已经走过了它八千年的漫长里程。传说中所说的三皇(羲皇、燧皇、神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即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此一时代的河洛文化,在全国率先进入到了文明的时代。如果说,三皇五帝时代可谓河洛文化的滥觞期;那么,到了夏、商、周三代,则可谓河洛文化的形成期和丕兴期了。迄至汉唐时代,河洛文化以其世界巨人的姿态,创造了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进到了一个极其光大鼎盛的时代。在此一时代里,河洛文化不仅写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而且为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林,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奠定了雄厚基础。宋代以降,到了元明清时代,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河洛文化亦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脚步,由鼎盛逐渐走向了衰弱。

纵观河洛文化由盛到衰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由盛到衰的历史。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和中国文明的历史。它是中国八千年文字史的一个缩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象征。

今观中国易学史,说到底也是河洛易学史。从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易学文化也已走过了它八千年的漫长曲折历程。从八千年前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即考古学上的裴李岗文化时代,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原始刻符数字,由此即可窥见其八卦起源之端倪。中国易学史,从其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大体可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8000—3000年前,可作为它的滥觞期;两周时代可作为它的集成(所谓“集成”,就是在此一时代《易经》和《易传》相继成书)期;两汉时代为它的丕兴期;两宋时代为它的鼎盛期;明清时代则是它的归宿期。明清时代之易学在此不论。中国易学辗转运行八千年,从其地域而言,亦都集中于中原河洛地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易学文化,其实质也是河洛易学文化;河洛易学文化,乃河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撰写《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可谓本题中的应有之义。

本书《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旨在廓清、阐明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 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八卦起源和《易经》来源问题

关于八卦的起源和《易经》的来源问题,千百年来为历代学者所困惑不解,而仅滞留于司马迁伏羲画卦和文王演易之说。即如按司马迁之说考察,有所谓伏羲画卦孟津说和淮阳说等,以及“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之说,其地域皆集中在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内。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从近代出土的大量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确证了司马迁诸说仅仅是个传说而已。那么,八卦的起源又究竟在哪里呢?它就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和甲骨文之中。今观贾湖墓葬中的龟甲,多与石子同出,证明是一种原始的占卜工具。若与殷墟甲骨联系起来看,在贾湖龟甲上,一个是原始八卦文字符号,一个是原始八卦数字符号,二者共同构成了原始八卦符号的孪生子。

关于《易经》的来源问题,从安阳殷墟出土的遗物中又可认定出《易经》之“父”位来。按照《易经》上的框架结构,即卦形(象)、卦名、卦爻辞和九六学四部分。在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易卦卜甲,与《易经》结构上的四部分,大体均已具备。再从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等处,如按照阴阳奇偶之数的原则,亦均与《易经》上的相应之卦对照考释。由此不难看出,《易经》的来源不在别处,就在以小屯南地易卦卜甲和四盘磨易卦卜骨为代表的殷墟数字易卜之中。只不过《易经》是在继承诸多数字易卦的基础上,取得了质的飞跃式的发展,终成就为具有哲理性的经书罢了。

就上述八卦起源之地和《易经》来源之地来说,毫无疑问,亦皆集中于河洛

地带的中心区域内。

(二) 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历史分期问题

对于易学史的分期问题,也一直为历代学者所迷津。究其原因,主要仍为八卦中的单卦及其重卦的起源问题所困惑。随着对易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现当代诸多学者亦不断为之探津:或曰伏羲画卦起源说,或曰周初文王演易说,或曰春秋解易开启说,等等。对此,迄今为止仍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易》绝非天上来客,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孕育、发展、演变过程。

自 20 世纪后半世纪以来,考古学上所取得的有关一系列重大文物发现和辉煌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开启这一千古难解之谜的万能钥匙。现在我们可以有根有据地把八千年易学史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依据本书各章的前后顺序,试作如下的梳理和划分:

(1) 滥觞期的中国易学(8000—3000 年前)。滥觞期所要解决的是《易经》的来源问题。概括来讲,《易经》源于占卜。从出土的大量可以确证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易经》未诞生之前,占卜所运用的形式为数字易卦。本书的第一章“伏羲时代之易卦”、第二章“炎黄时代之易卦”、第三章“夏商时代之易卦”、第四章“西周甲骨金(陶)文易卦”,所要解决的就是《易经》一书的来源问题。

就其滥觞期而言,又可分为三大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自 8000 年前的伏羲时代,经 5000 年前的炎黄时代,到 4000 年左右的夏禹时代,为数字易卦的雏形草创期;第二个历史阶段,4000—3000 年前,即从夏到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数字易卦由单卦发展演变到完整的重卦,由此而构成了数字易卦的成熟完善期;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为西周初、中期,此时的数字易卦已渐入突变期,就是说数字易卦到了西周初期则又呈现出甲骨易卦与金文易卦并蒂复兴的璀璨局面;西周中期以后,从出土的陶拍易卦中,确证了数字易卦渐入突变期之后,《易经》成书已经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了。用形象的说法也就是说《易经》一书在经历了数千年“十月怀胎”之后,此时此刻业已履行它的“一朝分娩”的重任。第五章“数字易卦与易经”,即是从数字易卦的演变与发展的全过程中,来阐明数字易卦与《易经》的关系问题的。

(2) 集成期的中国易学。所谓“集成期”,是说《易经》和《易传》相继成书的

时间当在两周时代。特别是作为本经的《易经》成书的时代,自汉经宋至清,学术界探讨此一问题长达两千余年。其间虽有不同的疑说,但总起来讲,司马迁那句“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少卿书》),不可否认地成为《易经》的作者及其时代的千载“盖棺论定”之说。然而从近代出土的大量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又从《易经》卦爻辞所载的历史事件中,皆可证明《易经》一书创成的时代非殷周之际,亦非西周初年,当在西周晚期的周宣王时代。本书第六章“《易经》成书时代考”,即为解决此一问题而作的探讨。

关于《易经》一书的性质问题,亦为历代学者所争论不休。或以为是卜筮之书,或以为是义理之书,或以为是生活百科,或以为是历史之书,等等。对此聚讼纷纭,见仁见智,各有其分说。但如果从八卦的孕育、产生到《易经》的起源、形成,再从对《易经》内涵的认识到对《易经》大义的分析,皆可视为此乃中国独有的一部哲学专著。本书第七章“阴阳乾坤与民族精神——《乾》卦、《坤》卦考释”、第八章“历史的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晋》卦与《明夷》卦考释”,即为探讨此一问题所撰写的两篇论文。

(3) 丕兴期的中国易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则出现了一种阐发、解说《易经》,用《易》、解《易》并进而为《易》作《传》的一种新现象。具有代表性的,即如春秋时代在《左传》和《国语》中,就是运用《易经》原理来进行占筮和解说;又如战国时代对《易经》的解说,其基本思想是阴阳变易观念,此一时期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出现了为《易》作传的即所谓《十翼》。然而易学的发展,到了两汉时代才真正达到了丕兴阶段。

那么,易学到了两汉时代为什么能够丕兴呢?一是秦始皇焚书不焚《周易》,易学之传承得以继往开来;二是《周易》(《易经》和《易传》)统称为《周易》,汉代解易是把《易经》和《易传》放在一起说的,自汉以后历代研易者均依此说)自身有一套合乎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思想体系和哲学意蕴,它不仅可以为封建统治者提出一套治国方略和统治之术,还可以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襟怀,给世人以启迪、激励和奋进。因此,当汉武帝独尊儒术、提倡经学、设五经博士之时,《周易》便一跃而被列为六经之首了。有如此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易学之丕兴便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了。丕兴期的中国易学,其表现的形式和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本书第十章“两汉时代之易学”所要承担的

一项学术使命。

(4)鼎盛期的中国易学。两宋时代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学术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易学史进入鼎盛期的一个异常重要的时代。作为鼎盛期的中国易学,其基本标志和主要特点表现为:

a. 宋代易学,流派丛生,新义迭呈。就是说宋代易学涌现出诸多流派,然而其各派易家皆不以追求《周易》经传文字中的训诂为己任,而无不重在探讨其《周易》中的义和理。

b. 而宋代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等,如北宋的刘牧、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李觏、胡瑗、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南宋的朱熹、朱震、陆九渊、杨万里、杨简、薛季宣、叶适等。而如此众多的学术大家,亦几乎无一不是著名的易学家。

c. 在宋代哲学史上形成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又同时无一不与宋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在北宋的易学中,以周敦颐(著《太极图说》)和程颐(著《易传》)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邵雍(著《皇极经世》)为代表的数学派,以张载(著《易说》)为代表的气学派,他们都是以易学为中心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南宋的易学中,以杨简(著《易传》)为代表的心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他们也都以心学派易学和功利派易学为中心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南宋的朱熹,则是在继承程氏易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周、邵、张、朱(震)等人的易学观点皆有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易学(著《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为中心的易学哲学体系,并成就了宋代的程朱理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易学,实际上也就是宋代的易学哲学。

就其地域而言,北宋易学的形成,皆集中于中原河洛地带,特别是被朱熹赞称的“北宋五子”(周敦颐、程氏兄弟、邵雍和张载),他们的学术活动,大多集中于洛、汴两京之内;他们的易学成就,基本上构成了两宋易学的主旋律。笔者为言“五子”而撰写了论文一篇,即《论北宋“五子”与河洛易学》(载台湾《辅仁学志·人文艺术之部》第三十三期)。而南宋易学的形成,可以说大多为北宋易学的传承和延续。特别是朱熹,他所代表的南宋闽学,实乃北宋洛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两宋易学,不论从表现的特点和成就,还是从地缘和文缘的传承与发展,皆可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本书第十二章“两宋时代之易学”,其旨即在探

讨此一问题。

(三) 关于“河图洛书”的源流真伪问题

“河图洛书”的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千载难解之谜,这个“谜”之所以扑朔迷离,难分难解,乃历代有些学者,特别是宋代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学者,各自以其所编或所创的“河图洛书”故事及其图式所造成的。

本书第十四章“河图洛书源流考”拟从河图洛书的源与流中,来追溯、探索和考察河图洛书的起源及其嬗变发展之历程,旨在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河图洛书说。例如,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说,是一种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则变成一种“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其图讖之说;两宋时代的“河图洛书”说,则又一变而成为“图九书十”和“图十书九”的一种图式,即如黑白点数。如此之黑白点数,以“假”乱“真”,流传至今,影响所至,不翼而飞。

概括来讲,本章之旨在于从河图洛书的源与流中,并结合目前对河图洛书研究上出现的问题,以期澄清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河图洛书原本与八卦九畴无涉;②河图洛书原本与伏羲画卦无缘;③河图洛书原本与河洛文化无关。

(四) 中国易学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那么,从中国易学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又有哪些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刚健自强的民族“龙战”精神。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国的典籍中,记载最多的远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莫过于“龙”了。《左传·昭公十七年》中云:“太昊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这是把伏羲氏作为龙图腾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三皇本纪》中亦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蜥氏女,少典氏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说的是炎帝乃龙之子。《史记·天官书》中说的“轩辕,黄龙体”,则是把黄帝称作黄龙。从伏羲氏、神农氏(炎帝)到黄帝,甚至于从远古、上古、中古和近古,无不把龙和龙的传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族徽和象征。

诞生于河洛地带的《易经》,被黑格尔称作是一部“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的千古奇书。《易经》中的第一《乾》卦,以龙取象,至善至美,寓意深远。《象传》和《文言传》,对《乾》卦中的“乾乾”作了深刻的阐发。《象传》云:“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文言传》亦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天行健”，是说天的运动周流不懈，永不衰竭；天的性格刚健中正，不卑不亢。“君子以自强不息”，此是告诫人们应该效法天的刚健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奋发图强，永远进取。也就是说，把人的自强不息的意志与天的刚健不辍的精神和谐地统一起来。此即构成“天人合一”。

天的健行周而复始，至阴极返阳，必然出现“龙战”。其“交感”的结果又喻示着万事万物别开一新生面。因此，我们说龙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力量源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了这种刚健自强的龙战精神，就一定能获得事业的成功，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繁荣昌盛。由此观之，龙战精神的基本涵义可以概括为：新陈代谢，革故鼎新，万物苏生。追溯其历史渊源，伏羲画卦制网罟，炎黄农耕奠业基，大禹治水安社稷等等，此是远古时代英雄人物的典型代表，华夏民族“龙战”精神的开山祖师。商汤伐夏，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和制礼作乐等等，又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领袖人物的优秀代表，同样是华夏民族刚健自强的“龙战”精神的鲜明体现。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云：“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对由《易》文化所产生并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的刚健自强的民族“龙战”精神的历史的生动的描绘和赞颂。

（2）厚德载物的民族人道精神。

《乾》卦主健，具有阳刚之美德，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主顺，具有阴柔之美德，表现出“厚德载物”之胸襟。《大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是说，《坤》卦具有厚德载物之美德，强调“以龙配天”，提倡“修身养性”。而把直方、宽厚、敬德保民、谦恭逊让、仁义礼智等作为圣贤君子之应有品德。《周易正义》中亦云：“直则不邪，正则谦恭，义则与物无竞，方则凝重不躁。”因此，这“直方”中的正直、端方、宏大、仁义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中的文化精神被继承下来，从而构成了民族中的另一精神财富——人道主义。

所谓人道,就是爱护人的生命、关心人的疾苦、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一种道德。人道主义在欧洲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说成是普遍的人性。这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过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中国的人道主义则起源于《易》文化中的宽厚仁义思想。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系辞传》所说的“人道”是针对“天道、地道”而言的。天道、地道即自然之道,亦即自然规律。所谓人道,就是人应该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与此同时则应保护人类、关爱别人、视人若己,提倡仁义之心。因此,中国的人道主义虽然同样具有阶级性,但是它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则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生命活力,时至今日,它依然具有强大的哲学生命力和价值取向。

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先生有言:“如同印度是形上学和宗教的圣地,中国乃为人道哲学之家。在中国所有的著作中,《易经》——形上学唯一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奇特的书籍,但由此展开了中国思想史的记载。”(《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1 第一卷《东方的遗产》第455页,东方出版社1998版。)从威尔·杜兰的笔下,我们找到了人道主义的源头。他把两千八百年前出现的《易经》一书,定性为人道哲学专著,中国思想史的发端。据此可知,中国的民族人道精神可谓源远流长,久盛不衰。

从历史上来看,西周初年周公辅佐,他提倡以德治国、敬德保民。可以说周公足可称为这种人道主义的开创者。《易经》晋卦的卦义所喻示的时代背景,就是周公东征平叛之后,委以康叔到殷墟故地任职一事。周公在《尚书·康诰》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明德慎罚”的政治路线。围绕这条政治路线,周公反复告诫康叔为什么要遵从这条路线和怎样遵从与履行这条路线。康侯不辱使命,他遵照周公的训诰,正确地解决和处理了周族与殷族这一对民族矛盾,以及其他极为复杂的矛盾,建卫立国之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中国共产党人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这种光荣传统的又一光辉范例。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着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这支英雄群体的政治宣言,用歌声抒发了这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大勇大智、大仁大义的情怀,以此赢得了五十多个民族的衷心爱戴,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

彻底胜利,建立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用理论和实践证明了这个胜利实际上也是《易》文化中的民族“龙战”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胜利,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革命优良传统。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民族爱国精神。

出生并成长于河洛地带的张载,是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和易学家。他有几句为千古所传诵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是说天地本来是没有心的,怎样做到“立心”呢?那就是立天、立地、立人。这句话是从《周易》中引申出来的一个道理。即所谓的“天人合一”。“为生民立命”,此是说要关心民众之疾苦,为民请命,为国奉献,为社会谋利益。

爱国主义所集中表现的,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无限忠诚和热爱的一种感情;与此同时,也是对任何妨碍、损害、侵扰自己国家、人民和民族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和反抗。从历史上来看,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民族矛盾激烈尖锐的时候,爱国主义愈加发扬,民族英雄也愈加凸现。从地域上来讲,中原河洛地区,地处九州腹地、十省通衢,素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因此,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爱国将领不乏其例,民族英雄应时而出。岳飞(河南汤阴人)是在人民中间成长起来的南宋爱国军事将领。他是在抗金斗争中维护汉族人民利益的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精忠报国,受到中国人民的景仰和爱戴;他的《满江红》一词,气壮山河,鼓舞人心,为千古所讴歌。另一位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他转战南北,镇守扬州,背城一战。在清军劝降面前,他提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死万段,甘之如饴。”史可法这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节,成为中国古代又一位被尊崇的民族英雄。在现代民族革命斗争史上,中原河洛地带的共产党人,如吉鸿昌、杨靖宇、彭雪枫等等,他们以中华之崛起和复兴为己任,英勇献身,为国捐躯,成为当今民族爱国精神的又一鲜明体现。

(4) 和谐统一、和睦相处的民族和合精神。

民族和合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和谐统一、和睦相处是中华文化中的最基本的特征。《周易·乾·象》中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说,大自然的运行变化往返无穷,万事万物按照各自的性能和特点在发展着。此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是说只有使阴阳二气的会合、冲和,才能保全其“太和元气”,达到阴阳和谐,万物“和合”。阳气周流不息,循环不已,又开始萌生万物,由此天下万方都可和谐统一、安定繁荣、顺美昌盛。此即“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保合太和”的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民族精神的又一表现形式。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开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的汉族,也正是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行程中,不断地融合、同化了许多民族才得以形成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的。在处理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族。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不断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发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而且往往是驃骑强悍的游牧民族,逐鹿中原。然而当他们来到中原之后,又往往被中原汉族的和合精神所感染、吸引,乃至融合后而加以同化了。魏孝文帝所建立的北魏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面镜子。魏孝文帝于公元495年,采用非常高妙的方式,把国都由平城迁到洛阳。接着,他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改服装、语言、姓氏、籍贯、婚制等等,即所谓的汉化政策。至今,在洛阳邙山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元魏墓志,就是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个历史明证。魏孝文帝的这一重大举措,使一个国家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的背景下,达到了民族的大融合,并紧紧地团结在以汉族为中心的周围,和谐统一,和睦相处。魏孝文帝不愧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中华民族的和合精神,还表现在对于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不断吸收、汲取、改造和融合。佛教传入中国,其后嬗变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是这一民族和合精神的又一成功范例。洛阳的白马寺,建造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被称为是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白马寺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和各项佛事活动的中心,而且为其后两千年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洛阳龙门石窟,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兴建的佛教石窟寺。北魏时期,江北有佛寺3万余所,僧尼200百余万人,单就京都洛阳就有寺院1367所。在中原地区,就现存地面建筑遗存来看,大都为佛教建筑模式。从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寺等的佛教建筑模式,以及各项佛事活动来看,都已经成为中国化的了。形成中国化佛教的另一特点,就是佛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

互影响、吸收、融合及其发展。如中国化佛教发展到隋唐时代出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大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此三宗所讲的许多问题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天台宗和华严宗均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的影响,并企图以“圆教”的形式与儒、道相调和;禅宗中的佛性论不仅与儒家的性善论相似,又企图与儒家的孝悌为本的封建伦理学说相调和,还有庄周的虚无主义思想、玄学家的得意妄言理论等,对禅宗思想的形成无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之,佛教及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站住脚、扎下根,并获得一个大的发展,以至于达到佛教的中国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这种和合精神所具有的宽容性、融合性和适应性。

第一编

滥觞期的中国易学